

哲学卷
文献大系
长江学术

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基
金资助

郑学 从论

刘大钧 主编

上海圖書館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長江學術

文獻大系

哲學卷

刘大钧 主编

鄭學 从论

離
九陽
居五
位九

坎
一陽
居二
位六

震
三陽
居三
位三

艮
二陽
居二
位二

坤
三陰
居三
位三

中

坎
一陽
居二
位六

艮
二陽
居二
位二

震
三陽
居三
位三

上海圖書館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学丛论/刘大钧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439-5855-5

I. ①郑… II. ①刘… III. ①郑玄(127~200)—哲
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234.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8174号

责任编辑:张 树

特约编辑:施 维 张照华

郑学丛论

刘大钧 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6 字数 520 000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5855-5

定价:45.00元

<http://www.sstlp.com>

目 录

前 言	刘大钧	1
郑玄研究论纲	葛志毅	5
郑玄与今文经学	边家珍	16
今、古文经学在两汉的发展、演变及郑玄对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	张文智	24
作为思想家的郑玄——以《三礼注》的内容为核心	王启发	45
郑玄易学的特色	魏元珪	56
论郑玄以《礼》注《易》方法	林忠军	68
郑玄易学爻辰说的哲学文化底蕴	王新春	82
易律融通:郑玄“爻辰”说对古代乐律学的影响	黄黎星	101
爻辰说:郑玄《易》注的显著特色	杨效雷	116
论马融、郑玄易学之异同	潘 斌	126
从孟喜、京房以迄郑玄“气化宇宙论”易学思想探析	赖贵三	137
清代的郑玄易学研究	陈居渊	167
郑玄易学与道家学术	李延仓	180
由郑玄“太易”说看老学、玄学、理学本体范畴之间的逻辑进程 ——兼论中国本体论哲学的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特质	刘云超	189
百年郑玄易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胡士颖	202
《诗·小雅·常棣·郑笺》“不”字训释研究	单周尧	209
论郑玄笺注在音训史上的成就	吴泽顺	220
简论毛传、郑笺在礼制和名物典章方面解释的不同	王承略 陈锦春	227
郑玄注纬之研究	吕 凯	236
郑玄《论语注》研探	唐明贵	254

从孔子“从周”问题看郑玄《中庸注》	王 广	267
郑玄《中庸》诠释刍议——以《礼记注》之《中庸》篇为中心的考察	解颐理	276
迷雾浓云:《孝经郑注》真伪讨论之回顾	舒大刚	293
郑玄佚著的整辑	刘伟杰	314
郑玄谱、笺中的教化思想	李世萍	318
郑玄与高密的故乡情缘	田绍义	332
《周易·大畜》上九“何天之衢”综考	谢向荣	337
《杂卦传》真的存在错简吗	李尚信	372
“易”“易简”“简易”考释	郭丽娟	379
“经典”“诠释”与“实践”的存有学探源——我对“经典诠释学”的一些理解	林安梧	385
论经学的兴起与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沈顺福	399

前言

刘大钧*

高密是大经学家郑玄的故乡。为纪念这位先贤,推动中国经学研究的发展,2010年7月20—23日,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中国周易学会、潍坊报业集团、中共高密市委、高密市人民政府在山东高密联合召开了“海峡两岸郑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台湾国际易经大会、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海内外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切磋问辩,围绕郑玄与经学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现值大会论文选集出版之际,就中国经学的意义与价值问题略陈管见如下,不当之处,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生当东汉末年的郑玄,面对西汉以来经学今古文对峙、各家经说日趋繁杂的局面,以“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为职志,“囊括大典,网络众家,删裁繁诬”,打破今古文经学的门户,叠用今古而遍注群经,实现了今古文经学的融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注解方法到注解内容都为后世所效法,成为中国经学的典范,影响深远。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郑玄经学依然以其不可替代的学术魅力,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去思考它所蕴含的丰富学术意蕴和精神价值。

众所周知,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经学则是儒学的根本。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删《诗》《书》,修《礼》《乐》,赞《易》,作《春秋》,接续起上古以来的礼乐文化,并将深沉的人文价值理性贯注其中,以仁为指导理念,塑造出一个熔旧铸新的儒家哲学文化和王道政治系统。虽然后世儒家经书数量不断扩充,由六经而七经、九经,最终确立为十三经,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儒家经典进德修业的精神主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使儒家经学从诸子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官学,其后两千多年,经学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学

* 刘大钧,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术研究的主流。经典不仅仅属于过去,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使儒家经学以多面的理论内涵,紧扣历史的脉搏,鲜活地呈现于各个历史时期,展现出历久而弥新的哲学及文化意蕴。各个时代的人们借着经典而走进历史,成就自我,走向未来。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史可以说就是经学发展史。冯友兰先生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将汉以后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称为“经学时代”,可以说是独具慧眼。两汉的学术固然是经学的天下,魏晋的玄义风流在老庄的浓妆重彩下,其底色何尝不是儒家经学的意趣。宋学则更是汉学以后从方法到义理都发生了极大转换的经学新样态,出现了以理学为主体的新儒学,钱穆先生甚至提出宋学较之汉学更为接近先秦儒学。清代以降,经学由精微玄妙的哲思转入求真务实的朴学研究,崇汉学而贬宋学,朴学大师们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标的,在经典本来面貌的考据训释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难看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学术思潮的形成与转进基本上都是围绕经学问题而展开的。

儒家经学就其表象来说是对六经、十三经文本的解读,是在研究这些经书,但其实质则对宇宙人生、历史文化、典章制度、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涵盖当今众多学科的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以本次会议的主题人物郑玄来说,首先他是一个杰出的经学家,再具体而言,他又是训诂学家、文字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天文学家、术数学家,等等,所有这些名号都不过是就郑玄经学成就的某一方面而言,在郑玄那里它们都是一体相通的。清代中后期以来,经学自身内部日益与时代问题脱节,外部则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猛烈冲击,尤其是到“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经学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绊脚石,在“打倒孔家店”的声讨中,很快走向没落。以西方学术体系为蓝本所建构的中国现代学科,将经学四分五裂,曾经作为中国人文价值来源和学术中心的经学,彻底成了无处安身的游魂。

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五四”以后经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经学史的研究。暂且不论这种看法的偏激和对传统文化的敌视,所谓我们需要做的经学史的研究也并不令人满意,片面而乏味。一直以来经学史的研究论著,包括皮锡瑞的《经学历史》、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和现当代的些许经学史作品,都不过是在描述经学的形成过程和经学史上的历史事件,并不关心经学的义理和其核心价值之所在。这也无怪乎今天许多经学史论著都出自古籍文献研究机构。反过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则是

抛开经学而另起炉灶。于是,经学史中无思想,思想史中无经学,前者没有灵魂,后者没有根基。真正能够在深入考察辨析的基础上统合义理、考据、辞章的经学史尚未出现。正因如此,我们此次郑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海峡两岸文、史、哲领域的众多学者,希望通过多学科、多角度的探讨能够对郑玄经学、汉代经学乃至经学之整体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和理解。

近二十年来,经学研究逐步走出“五四”的低谷,开始摆脱某些错误观念的束缚,正视自身的学术特色和思想资源,学术界也一直在寻求恰如其分地研究经学的方式与方法。经学史的研究在一定层面上也是经学的研究,关键在于能够直面经典,把握住经学和经学史中的问题,我们既要弄清古人在经典及其注疏中说了些什么,更要思考古人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不能明白经典之用意,那么对经典本义的理解就不够充分,甚至产生误解。通过对经典之用意、经典之问题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走进经学,把握其伟大的意蕴。不断地向经典回归,是中外思想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当走进经典的时候,我们面对的绝不仅仅是过去,经典所开启的宇宙人生之思,为我们思考和处理现时代的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迪和指导。儒家经学所诠释的礼乐文化,向世人揭示的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有序与和谐,而这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自我成就的永恒的主题。因此说,今天经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纯粹整理故纸堆,而是透过经典走进历史、审视当下、走向未来的人文学术研究,是我们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接所必不可少的文化探索。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话语范式转变的困境,也只有重新回到经学,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原初土壤中去,才能发掘出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才能在现代问题的考量中开显出新时期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世纪之交,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清华简中的古文《尚书》以及郭店战国楚简等等,都是经学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为我们重新解读儒家经典、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李学勤先生甚至提出:“世纪之交出土的简帛,已经涉及中国学术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关系到整个学术史以及有关问题。”简帛文献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但传世文献的研究还应是学术研究的重心,两者并无抵触之处,完全是彼此相应的。所以我们在简帛文献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在郑玄故里举办这次海峡两岸郑玄学术研讨会,一则是希望以郑玄经学研究为向导,推动两汉经学乃至整

个经学史的研究,二则希望传统经学研究能够以简帛学术研究相呼应,从而使中国经学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交互研究中能取得更大的成绩。清儒王夫之云“六经责我开生面”,做好传统经学研究,做好经学与现代的对接,正是我们现在无可推卸的责任。

郑玄研究论纲

葛志毅*

为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文化,我们必须关注汉代经学大师郑玄。

孔子修订六经,奠定儒学传衍的经典根基,汉代尊儒则确立起阐释六经的体系范式,后世的儒学发展大体以汉代经学为遵循成法,所以为认识汉以后儒学,必须解读汉代经学典型。郑玄是总结汉代经学并开创经学史上“小统一时代”的枢纽性人物,所以为认识汉代经学并进而理解全部儒学,郑玄是必须面对的研究对象。进而从大的方面也可以说,郑玄是研究中国古代经学、儒学、哲学思想乃至学术文化都必须面对的重要人物。郑玄被认为是集功过是非于一身,有在当时或稍后无法认清而必在千载之下方可评量其可否者,皮锡瑞曾有感于此而发论曰:“事有不可一概论者,非通观古今,不能定也。《毛诗》《左传》乃汉时不立学之书,而后世不可少;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而后世尤不可无。汉时《诗》有鲁、齐、韩三家,《春秋》有《公》《谷》二传。《毛诗》《左传》不立学无害;且不立学,而三家二传更不至淆杂也。汉后三家尽亡,二传殆绝,若无《毛诗》《左传》,学者治《诗》《春秋》,更无所凭依矣。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然颛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此功过得失互见而不可概论者也。”^①皮氏通观古今学术发展大势以论经学与郑玄得失,询为知言。后人往往指责郑玄混淆今古、败坏汉儒家法专门之学,然今日欲究汉学今古及家法专门,舍郑无由。为什么?因为汉代经学家中传留后世注述最多者,以郑玄为首选。何以如此?因为在汉代经学家中,郑玄宏通博大,造诣最深,故汉学传世,亦舍郑莫由。就是对这样一位集功过是非于一身而颇复杂的学术大师,今日研究甚为不足。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皮锡瑞虽谓郑玄杂糅今古,败坏汉学家法,但并未因此否认他作为古文家的经

* 葛志毅,大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

①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1页。

学地位。这是历来大多数学者的一般性观点。但近年有人提出,郑玄已别成所谓通学或综合学派,从而在今古文之外另成家派。此说颇值得斟酌。因为就郑玄治学仍旧宗主古文经的立场及主要采用训诂考据的特点而言,他仍应归属为古文家无疑。即便后来有王肃起而与之相争,但大体不出古文内部的门户对立所导致的经说大义异同之辩的性质。这是郑学体系的古文性质仍有待考辨澄清之处,亦应引起研究注意。

郑玄一生著作甚多,经注中唯《毛诗》与三礼完整传下,其他绝灭散佚不一,故自宋代起,学者们研究郑玄的一个着眼点,就是考求搜辑其遗作,这方面的辑佚整理功夫以清儒为可观。如袁钧辑《郑氏佚书》,黄奭辑《高密遗书》,近年《齐文化丛书》中辑有《郑玄集》,后出转胜,最富代表性。清代尚编有郑玄年谱、纪年之作十余种,还有如陈澧《东塾读书记·郑学》这样的专题性研究成果。此外在清人的文集笔记中颇多有关郑玄的片断研究小札,若能荟萃为一编,于郑玄的综合研究不无助益。20世纪以来,除一般经学史、哲学思想史、文献学史及学术史等著作中对郑玄作些概略性介绍外,也有一些关于郑玄三礼学、《毛诗》学、《易》学、《书》学等专题性研究论文,但不算多。其他成部帙的著作如张舜徽《郑学丛著》、唐文《郑玄辞典》、林忠军《周易郑氏学阐微》、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史应勇《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王利器《郑康成年谱》,台湾出版的如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吕凯《郑玄之谶纬学》、胡自逢《周易郑氏学》等^①。总之,随着近年学风的转入相对深沉扎实,郑玄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仍远远不够。因为现有的成绩仍主要限于资料的搜求考订,以及内容相对褊狭的专题性研究,作为对郑玄经学的综合性研究专著至今未见。其中原因之一,殆因郑玄经学涉及的内容过于专门艰深,非有相当的专门学养无从措手。其二殆因郑玄偏于考证训诂,名物象数,看似缺乏思想内容,令人感到枯燥而不愿问津。其实郑玄与孔子述六经而不作同为中国治学传统,郑玄也是借整理传述经典寄寓发抒个人理想,在借古典立言。只要深入钻研其经学传注,便可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个经学家的政治抱负、文化理想及社会时代期望,因而对郑玄经学的深入研究,会在新的层面增进人们对其思想文化意义的领悟。此外,为解读中国传统学术,无论从资料、方法到体系、理念,郑玄都处于核心乃至根基的地

^① 与郑玄研究有关的佚文辑录及研究论文、著作之介绍,史应勇:《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较详,巴蜀书社2007年版。

位,都是必须面对而无从回避的。简溯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轨迹,会有助于对此的理解。两汉经学是先秦学术的整合、集中与深化,从而为中华文化建本奠基。经魏晋隋唐宋明的分合演化,至清代则重返汉学之本而开日后近代之新。人们称誉清学所乐道的口头禅是所谓“人人许郑,家家贾马”,其中郑足以冠冕许、贾、马,这是清学的根基所在。清代学术实为近代文化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是清代汉学加近代西学熔铸成近代新学。日后在新学转进益大的过程中,郑学这些传统根基日益被遮蔽、忽略而淡出,这是在重振传统、重建学术和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化重构过程中必须校正的。只要承认中国文化中经学积淀之重要,郑玄就是必须重新发掘的重要学术资源,否则也将无解于记载中“伊、洛以东,淮、汉之北,[康成]一人而已,莫不宗焉”的称誉之词^①。总之,是汉学在中国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郑玄其人的学术文化价值。

与国内的郑玄研究相比,国外更显不足,专题性及综合性研究专著至今未见,此外仅在相关论著中可见对郑玄的一般性叙述介绍。这方面的例子,较早可举20世纪30年代较有影响的日本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对郑玄只能说是经学专著中的一般性叙述介绍。近年较有影响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仅在学术文化部分四次提及郑玄之名^②,关于其经学成就仅一带而过,根本无法使人感到郑玄在汉代经学史上地位之重要。关于郑玄之重要,仅举其与何休论辩一事即可看出。《后汉书·郑玄传》曰:“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鍼《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拾遗记》卷六也记载了郑、何相攻难之事,并曰:“及郑康成锋起而攻之,求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这两则记载之重要就在于,说明郑玄与何休分别是今古文两派经学的标志性代表人物,而郑玄又是古文经学成熟兴旺的关键性代表人物,这使郑玄学术地位之重要很清楚地突显出来。但在上述二书中,尤其是《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叙述中,根本使人无法感觉到郑玄在汉代经学发展中的那种重要地位。而之所以如

① 吴云、唐绍忠:《王粲集注》,中州书画社1984年版,第118页。

② [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20、875、876页。

此,反映出国内对郑玄研究之不足,因而郑玄研究是国内学者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这是不能责望于外人的。综据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可以说,“郑玄经学研究”是极有意义、填补空白性的课题,其完成将极大推动和深化中国古代经学史、儒学史、文献学史、哲学思想史乃至学术文化史的研究。

关于郑玄研究的重点,目前应该重点放在综合探索郑玄经学体系的渊源、其体系的内容结构及其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方面,以全面评说郑玄体系的学术贡献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使郑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其主要研究内容分析如下:

1. 从经学原始入手探寻郑学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

孔子总结继承三代文化并借宣传三代寄托自己的理想,于是整理编订六经。孔门后学继承孔子之绪弘扬六经,其中要以子夏、荀子传经之功为多,郭店简等出土文献的发现,使七十子后学的传经成绩重新被人们认识。孔子以后下启两汉,这是汉代经学的本原由来,也是理解郑玄经学理念及其体系建构的学术根据。

2. 汉武尊儒,立博士官学,汉代经学正式发端

首先,汉代经学在观念体系及思想方法各方面都可为后世典范,汉以后儒学也是在汉代经学的系统影响下传承演化,由此而言两汉经学可视为一整体。其次,汉代经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今古文之争,二者各以官学、私学的不同立场相互颉颃争衡,作出各自的贡献,并在今古两派的对立态势中显现汉代经学的发展成就与总体趋势。其中今文经学在汉初当秦焚学之后,恢复光大儒学,亦为繁荣汉初学术文化作出贡献。但博士官学体系终因朝廷禄利而在日后的发展中膨胀为章句繁琐之弊,腐败滞固,乃至失去学术活力而衰微颓靡。古文经学则因长期以私学形式发展而保持旺盛生力,复显示其治经优长,较今文更具理性,能以训诂考据之法弥补口耳传习之弊,必将取今文而代之。今文治经方法原始质朴,拘束于口耳传习之法墨守师说,既少发明又难有经义创新突破。古文经学则因几部古文经典的发现,在整理阐释过程中总结出一套较完善的训诂考据方法,远较今文口耳传习之法合理,从而在方法体系诸方面超佚而上。此外,从汉代经学向魏晋经学转变,在整体上显露出义理化趋势,要求摆脱今文那种数术秘纬式思维旧路而求新。郑玄乃是既通今文又有极深古文造诣的经

学大师,学力深厚,吐纳博大,熟谙汉世经术本末,具备融汇今古,创通求新的识力。他遍注群经,发展起以古文为主、兼取今文而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家法范式,因而以总结两汉经学的魄力开创出郑学时代。

3. 郑学博大深广且自具家法特征,以经学为主有多方面贡献

第一,儒家礼学源于三代,传自孔子,最后确定为三礼体系则成于郑玄。儒家礼学最初主要关注日常生活礼仪及相关的社会公共仪式,自郑玄以《周礼》冠诸三礼之首,使礼学由关注礼仪、仪式而转向对国家政制的重视。汉儒认为三代盛时皆制礼作乐,王莽更用《周礼》改制并宣传周公制《周礼》致太平之说,郑玄冠《周礼》于三礼之首实受此启发。如此既提高了礼学的政治文化价值,也符合儒学的经世致用取向,专精三礼更成为郑学一大特色,因而被后世奉为礼学圭臬。郑玄又推广礼学于他经,如以礼说《诗》及以礼注《易》皆是。按黄以周考证郑玄注经次第,以三礼为首^①,故三礼亦成为郑学之本。第二,充实完善《毛诗》体系。《毛诗》本有《序》及《毛传》,郑玄又配合《序》作《诗谱》,为补申《毛传》而作《笺》,以训诂解《诗》,以礼说《诗》,以史证《诗》,同时又摘取三家诗义补益《毛诗》,使《毛诗》体系完善。后来《毛诗》得以取代三家今文而独传,其功全在郑玄。郑玄以正变美刺成法说《诗》,突出《诗》学的人伦教化功能,深合儒家《诗》教的伦理价值旨趣。第三,以象数解《易》的同时兼纳义理人事。汉代受孟、京《易》学影响,好比附天人性命占验,象数之学占据主流。受此影响,郑玄亦以爻辰、互体、爻体及五行等说《易》,但此仍与京房用纳甲于筮法有异而表现其《易》说之特点。此外,郑玄以礼解《易》,以史证《易》,实可视为后来王弼《易》学“全释人事”的端倪。第四,郑玄深于《书》学。《尚书》经文古奥,非长于声韵训诂考据者难明,郑玄为古文大家,于此当仁不让。王先谦曾谓:“郑君以汉末儒家,杂糅今古,为《书》学一大变。”^②郑玄实为古文《书》学代表。郑玄《书》注外,尚有《书赞》《尚书义问》等多种。第五,郑玄《春秋》学造诣精深。郑玄几遍注群经,唯未留下专门《春秋》之注,但这并不影响他《春秋》学造诣之深。他在《六艺论》中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讖,《谷梁》善于经。”可

① (清)黄以周:《傲季杂著·文钞》,卷四,《答康成学业次第》。

② (清)王先谦:《今文尚书考证序》,载(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证其洞悉三传大义,深知其旨归所在。郑玄在与《公羊》大师何休的论辩中迫其义屈辞服,在各经注中往往引《春秋》为说,凡此皆可见其《春秋》学之造诣。第六,郑玄贡献于古文献学颇大。郑玄博通渊深,精小学,长训诂,工校勘兼具辨章学术,考镜六经源流得失功夫,这在其遍注群经的成绩中已有所显现。诸如在校讎训释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尤其在运用声音通假方法解读古书方面创获颇多,其注经说字条例可为后世注释整理文献之学昭示典范。第七,郑玄与纬书。郑玄最为后人所诟病者是他不仅注纬,而且引纬说经。其实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汉儒解经的传记丛书,因而若从今文经学家崇信纬书的角度视之,郑玄引纬书说经犹引传记以解经,本无足怪。况且纬书中有诸多关于天文、地理、历史、神话、数术、方伎类知识,不能概以荒诞视之。纬书中关于天文星占类内容近一半之多,故郑玄通习纬书的同时亦精天文历法之学,因天文历法而精研数学,数学固为儒者治经学之所必需。虽人多斥纬书妖妄,但纬书中习见的天文历算知识殆非素无此修养者所可解^①。若如金鹗之言,《史记》《毛诗传》《尚书大传》中俱有纬书之说,则司马迁、大毛公、伏生皆先于郑玄而用纬书著史说经,是参用纬书不始于郑玄^②。近世刘师培曾概言纬书之价值有如下六方面,即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格物^③。自清儒以来已有学者对郑玄引纬加以辩解,故应分析对待,不能一概否定。第八,郑玄通习汉律。汉代礼、律密切相关,故汉儒多通汉律,亦有以《春秋》决狱之事,郑玄作《汉律章句》,又每引汉律为说,此为郑学一长,反映出汉学重经世致用的特点。第九,郑玄学术理想及人格取向堪为古代儒者典型,足为今日借鉴。学术造诣之外,郑玄的人格遭遇也很值得注意。郑玄专意经学,无心仕宦,屡辞官府征召,但仍被牵连入党锢,备受当道烦扰。以一介布衣,却在学术上、政治上在当时和后世产生如此影响,其命运遭遇为古代学者的代表。郑玄注经“述而不作”,但其中寄寓其理想深意,有待后人解读发掘。如郑玄冠《周礼》于其三礼体系之首,就是一极耐人寻味之事。《周礼》本名《周官》,本为一部政治行政法典。据《隋书·经籍志》:“《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邵懿辰《礼经通论》曰:“盖其书之体,本诸司职掌,

①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7—278页。

② (清)金鹗:《纬候不起于哀平辩》,《清经解》卷一三九〇,第7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865页。

③ (清)刘师培:《讎纬论》,《刘申叔遗书·左庵外集》卷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为周家一代之制度,而不可名以‘礼’,郑氏特因三百六十属偶合三百之数而牵合之也。”^①是《周官》本行政法典,乃国家治道理法之总汇。郑玄出于使其附托于儒家礼学的目的,改名《周礼》且纳入其三礼体系之内,如此实使儒家礼学被改造。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又何在呢?察东汉末名教腐败,选举失实,政治黑暗,引发深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刑名法术之学因之重又兴起,一些有识之士如崔寔、王符、仲长统等,以循名责实的精神对当时社会加以批判。衰世的刺激,使政治清明及太平理想重又弥漫一世。太平本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由修、齐、治、平而太平,是此理想之转进升华,并在公羊学的三世说中得到集中反映,曾产生深广的社会影响。《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功成,“天下于是太平治”,此显然是以儒家经学话语文饰起来的夏代政治记事。考战国秦汉之际的儒生与方士之合流,导致谶纬之兴起泛滥,太平之说亦大张其势。经过宣传鼓吹,秦皇、汉武俱曾有意致太平,西汉哀帝且曾以“太平元将”为年号。《汉书·叙传》谓王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风俗,采颂声”。王莽代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宣传效法周公治礼作乐的圣迹,为此又“发得《周礼》,以明殷鉴”。经王莽的宣传,《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书深入人心,刘歆、郑玄都着力崇信显扬其说。《周礼》因牵合于周公而增强人们对其政治效应的认同与期盼。在东汉末的社会批判思潮中,与郑玄相先后的王符,在《潜夫论·本训》中也提出“兴大化而升太平”的主张。尤可注意者是《太平经》的出现,表明太平理想又以宗教思想的形式深入到社会心理的深层,这不仅极大张扬其影响,而且也渗入东汉末的社会批判思潮中彰显其鼓荡作用。受此刑名法术思想与社会批判思潮的启发推动,郑玄把本为政典的《周官》冠诸其三礼之首,是为借助治道理法之力强化儒家的礼制体系,追求礼法与政法密切结合所能发挥出的实践效果,所以这里寄寓有郑玄摆脱汉末乱世、实现太平治世的儒学理想向往。由此可见,郑玄构造三礼学体系决非述而不作,自有其政治理想纳入其中,这应是郑玄抬高《周礼》的真实用心所在。对于郑玄其人,剖析其生活经历及思想,对认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事业追求及社会使命乃至学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价值等,极有意义。

4. 郑玄对魏晋隋唐宋及清代经学的影响

郑玄之后有王肃出而与之相争,但王学不久衰微。王学虽带有某些义理新

^① (清)王先谦主编:《清经解续编》第5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591页。

意,但郑、王之争大体不出汉学训诂的体系。郑学尤其是其三礼及《毛诗》学,乃经学上乘,无可取代者,故历南北朝隋唐至宋清被学者尊为典式。其间北朝胡人立国,佛学盛行,全赖郑学代表的经学体系维系中国文化正统,朝廷议礼,儒者论学,亦多引郑学为据。其间南朝虽以义理相高,但郑玄代表的汉学训诂考据之法仍作为解经根本而不可动摇,乃至唐修诸经义疏,仍不得不以郑学为主。宋儒高倡义理,菲薄汉学训诂,而朱子褒郑不遗余力。清代经学大盛,郑学复兴,学者备极推崇,至以“许、郑学庐”“仪郑堂”“郑学斋”自号。经有清一代,郑学代表的说字解经、古文考据之法大明,是后又随甲骨、金文等新资料的发现和运用,直接促使“罗、王之学”代表的现代治学方法应时而生,其于古代经学向现代史学转换过程中的方法论启示意义,无法估量。

在上述关于郑玄经学主要研究内容的四方面中,其第三即关于郑玄经学体系内容结构的分析评说部分,应为重点所在。之所以要对郑玄体系从其渊源、结构及其影响诸方面,作出较为全面的研究评述,意在借郑玄的个案实例,展示中国古代儒学体系在知识建构、理论形态及宇宙观和方法论方面的一般形式化意义,由此又可使郑玄体系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典范地位得到光大彰显。即为明确郑玄乃是两汉经学发展之最后一人,亦是魏晋经学发展之最初一人,是孔子之后以布衣身份留下巨大学术影响,并在经典诠释、资料梳理、体系建构诸方面,对儒学发展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位硕学博通式大家,堪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演进发展历程中的中坚大师。

郑玄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从纵横多方面研究探索郑玄体系的学术地位及其价值和特征。即一方面具体分析郑玄经学体系的建构诸内容,以便从横切面上为评说其经学造诣及其体系特征,提供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根据;另一方面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历史比较中,为郑玄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准确定位。

郑玄研究的基本方法如下,其一要打破旧的儒林宗谱式的经学史研究旧路,采用哲学思想史、学术史、文献学及文化学等多学科方法综合研究。其二要运用考古资料。金石、甲骨久已被赋予证经补史的功能,新出简帛文献诸如马王堆帛书、郭店简及上博简、清华简等与儒家相关的资料,除可丰富研究资料来源的意义外,利用新旧资料间的考证比较也有助于研究方法和义理阐释上的深入创新。其三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分析解读郑玄,指出其经学体系自身及其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的思想文化意义;既要以实证方式利用各种资料建立